



理想主义+



204796952

G239.22

1

——《中国青年》的故事

● 彭波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G239.22
T/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奇如歌:《中国青年》的故事/彭波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565-2

I. 传... II. 彭... III. 中国青年-概况 IV. G23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825 号

特约编辑 彭明榜

责任编辑 陈 军

封面装帧 赵为群

传 奇 如 歌

——《中国青年》的故事

彭 波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8 字数 189,000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208-03565-2/G·678

定价 18.00 元

中国最富传奇的杂志 (代序)

王 林

毛泽东三次为它题写刊名；周恩来对它求必应；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邓中夏，这些名字如火把的人物是它的编辑；三次停刊，又三次复刊；推出了雷锋、王杰……；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潘晓讨论”搅动全国；机关刊大胆走市场……

这是一本传奇的杂志！这是一部杂志的传奇！！

——题记

如一位少年侠客，无畏无惧，激情似火，刀剑如霜，风云叱咤，这是恽代英们的《中国青年》……

1923年初冬的一个上午，几个年轻人聚集在上海南市一

条小里弄的一幢老房子里，有些苍白的阳光透过房间小窗送去一些暖意，房间里的年轻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一本薄薄的小杂志在他们手里散发出油墨的清香。一个人轻轻而激动地朗诵着：“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在这几个激动的年轻人中，就有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恽代英，那一年他28岁，已是老资格的社会活动家。8年后，恽代英以一首狱中绝诗令天地动容：“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那一年，这位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在刑场上从容就义。

1923年10月20日上午，作为主编，恽代英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刚刚创刊的《中国青年》。这是直至今天已出版了一千多期的《中国青年》的源头，如在封冻寂静的冰原上，第一滴水的铿然滴落便引发了一条大河的奔腾。这条大河便是《中国青年》，它一点点激荡起来，一天天汹涌起来，许多人物随着它的变化沉浮着，在中国现代史和新闻史上，你已经无法忽视这条大河的存在。

《中国青年》一开始就有它的红色背景，作为中国青年团的机关刊，它的战斗色彩几乎是一种天然。在那样一个阴晦的年代，《中国青年》的出场绝对是独树一帜，它不同凡响的呼叫让许多年轻的心砰然而动。它最强烈的鼓动是对祖国的拯救，因此它对自己使命的阐述格外明确而主动：“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除一切陈腐邪

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对另一位传奇英雄萧楚女的怀念中找到佐证。萧楚女是站在《中国青年》这条大河发源地上的硬汉似的革命者，他无任何学历的贫苦之身竟能站在大学讲台上，以其博学和热情让青年学生倾倒，就因为他对革命的鼓吹和灼见。萧楚女与他的朋友恽代英曾一同在《中国青年》最初的日子里共同战斗，成为辉映在《中国青年》上的灿烂双星。恽代英与萧楚女同样都富有激情，这是革命者共同的标志，但是萧楚女更显得文如刀剑，为《中国青年》这本杂志留下了鲜明的印痕。“不要装聋，不要躲闪。”“硬刀硬枪，摆事实，讲道理，才是角色。”这是萧楚女对虚伪的论敌的教训。而对自己人，则是号召要“进攻，进攻，不断进攻！”在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浪漫安恬的桃花源之梦，你想逃避现实吗？“孤居首阳山，朝对飞云，暮听寒蛩，纵然冰清玉洁，有何意义？”这是革命者对人生无选择的判定。“不要回避现实，如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个七进七出。”萧楚女的激烈壮怀，就是《中国青年》的真实色彩。

《中国青年》创刊时期对革命的号召源自这些革命者的本能，《中国青年》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职业编辑，他们的身分其实都是职业的革命家，而且异常年轻。在《中国青年》早期的创办者中，不仅恽代英、萧楚女在革命者中名头极大，林育南、邓中夏、李求实及张太雷，也都早已是“身经百战”的青年英杰，他们在进入《中国青年》之前已经是出入于各种罢工、集会、学潮等激烈活动之中的组织者，在离开《中国青年》之后，他们同样如注定一般走上了一条牺牲之路。萧楚女在病中被

敌人拖赴刑场，却毫无愁容地畅笑：“我一个要死的人了，你们还不愿让我死在病床上，硬要送我一个革命烈士的名义，我谢谢你们的美意，我将欣然去死，含笑九泉！”死时 34 岁，一派理想与浪漫的大家风范！林育南与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被捕，不久，李求实也推开东方旅社的房门……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个青年一同在上海龙华被敌人集体屠杀，鲁迅在龙华惨案发生后，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林育南死时 33 岁，李求实死时 28 岁，……邓中夏被杀于南京雨花台，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这样一批人，一批要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当《中国青年》这本杂志从他们手中间世时，那字里行间便自然是血的热和激奋的情，哪里容得下风花雪月，哪里顾得上低唱浅吟？看一看这些抛头洒血的青年志士，发刊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是何等风骨，根本不需更多的文字来说明。

邓拓在回忆 20 世纪 20 年代大革命时期的情形时说：“那时候，不少年轻人的衣袋中，常常藏着一本 32 开的周刊；在反革命统治的角落里，这样一本刊物，又往往要秘密地传递过十几个以至更多人的手。它和《新青年》、《向导》同时成为革命的群众、进步的学生、教职员乃至一部分稍有新思想的老先生们所热烈追求的读物，一直到它停刊之后，还有许多读者到处寻求。”邓拓说的这本刊物，就是《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发起于革命初期，随着革命浪潮的起伏时而公开发行，时而秘密传递，到 1927 年，它的发行已达到 3 万份，而且基本保证每周一刊，这在各种条件极其恶劣的当时已经是一个奇迹。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海

立刻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青年》在3月26日出版了第160期后,从上海撤到武汉,一直到5月30日才出版了161、162期的合刊。6月20日,第165期出版,在《告读者》中说道:“《中国青年》这几个月来一直在惊涛骇浪中!蒋介石之叛变,使我们一切辛苦经营的规模,几乎全盘破坏!从上海移到武汉后,接着就是CP和CY的大会。虽然正当时势激变,许多读者都写信来要求赶早出刊,我们竟自愧不能应命!”“现在我们又重整旗鼓来与亲爱的革命青年相见了。此后的《中国青年》,竭诚的欢迎读者来稿通讯及批语,同时还要竭力的把CY介绍给读者,这件事以前是没有做到的。”但是,此后《中国青年》又艰难地出版了5期,在1927年10月,因环境险恶而被迫停刊。

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共出刊170期,从第一期“政治太黑暗了”的浩叹到最后一期“唯有暴动的争斗才真正是民众的争斗”的呼叫,《中国青年》以其惊世骇俗的战斗激情度过了它四年的创业历程。这四年很短,但很灿烂,因为有一群年轻的革命者云集在它身边,他们才华四溢,激情豪迈,议论纵横,真可谓极一时之盛。《中国青年》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辉煌,这份辉煌的背景是一群年轻而赫赫有名的革命者鲜血的红色,这使它在以后的任何时候都不曾怀疑自己的使命,以致在70多年之后,市场经济的规则冲击着传统观念的时候,它必须在一种难以理解的疑惑中寻求新的理解。

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青年》终于沉寂。之后,代表青年团的刊物是紧接着在上海创刊的《无产青年》,从1927年

11月7日到1928年1月,只出刊5期,后改名为《列宁青年》。《列宁青年》虽然在根据地坚持到1934年3月,但它的出版一直处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不仅出版周期经常改变,到后来只能以油印的形式出版,时而似刊,时而似报,更像是一份内部材料。

如一位少年侠客,无畏无惧,激情似火,刀剑如霜,风云叱咤。《中国青年》起于黑暗,沉静于黑暗,但它在黑暗中留下了一道电光石火,这便是一颗终要燃烧起来的种子。

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它那份作者名单……

1939年4月,春天的阳光安静地洒在延安,《中国青年》复刊了。毛泽东第一次为这本刊物题写了刊名。这时的《中国青年》多了一份沉稳,少了些火气。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中国青年》五项任务:动员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中国劳动青年和各进步青年团体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帮助青年学习和表扬中国青年在抗战中的英勇业绩。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只出版到第8期后就无法维持半月刊的周期,纸张、印刷材料的贫乏使这本32开40页左右的杂志常常无法按期出版。这时的《中国青年》更有了一些专业的色彩,它的编辑也开始由职业宣传工作者和文化人担任,比如后来著名的出版家韦君宜就在这时走进了《中国青年》。尽管经济的困难影响着《中国青年》的出版,但是它毕竟是在革命政权的中心地带,那种创刊时期每天都有的对生命

的威胁不存在了，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看到的不再是急切的呐喊和激烈的抨击，而是多了一些工作的研究和对选题的探讨。韦君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记得刚到《中国青年》时，科长杜绍西嘱咐我的就是：看稿子你得公平对待。对于负责同志的稿子，该改的也得改。如果他有语句欠妥的地方你放过去，将来登出来，反而对这个负责同志影响不好。我们组稿子范围就是各地来延安的干部，请他们写工作经验和通讯。”“刚开始对于青年刊物究竟应该怎么办，实在心里没有谱。”我们没有看到恽代英、萧楚女们所写的编辑回忆，但相信他们绝不会遇到韦君宜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青年》对他们来说就是手中的号角，腰间的利剑，他们想的是怎样唤醒沉迷的青年，鼓舞战斗的同伴，揭开骗子的伪装，痛击敌人的要害。比之恽代英、萧楚女时的杂志，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更注重青年的修养和工作精神的传递，它在第3期就增设了文艺栏目，可以想见这时《中国青年》的从容。在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它的那份作者名单，如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明、吴玉章、李富春等，几乎囊括了当时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是，纸张和印刷材料的缺乏使《中国青年》的出版显得异常艰难，另一方面，它的发行也面临着极大的问题，它的读者和作者主要集中在陕北根据地，它很难传递到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地区。到1941年3月的第5期，《中国青年》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停刊，在这一期的“编者致读者”中说道：“现在要报告读者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本刊因印刷关系，从下月要和读者暂时作两个月的分别……”到这时，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两年中共出刊29期，这其中包括在晋西兴

县出版的三期晋西版《中国青年》。遗憾的是,《中国青年》在两个月后并没有与读者见面,这一别就是漫长的7年,在这7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中国青年》再一次回到读者手中时,一个新的中国已经即将诞生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中国青年》
是一个真正的阵地。在纸张困难的时候,
连共和国总理都为它的发行操心……

《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是距它创刊25年后的又一个冬天。与创刊时不同的是,这时的阳光是温暖的,洒在田野里,人们心中抑制不住一种喜悦。

1948年秋天,在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地夹峪,八九个青年在两座四合院的瓦房中静静地忙碌着。这里距中央所在的西柏坡只有两里多路,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一种革命即将胜利的兴奋感染着在小院里工作的每一个人。一堆堆的稿件放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除了这些稿件,还有一件东西让这些年轻人格外高兴,那就是毛泽东题写的“中国青年”四个字,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更为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后来又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毛泽东一生中三次为一种刊物题写刊名,曾让多少人为之羡慕。

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的第1期出版了。毛泽东不仅为它题写了刊名,还它为它写下了著名的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这时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一个新的局面摆在人们面前：战争即将结束，建设新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任务，因此《中国青年》上的文章更多的是指导青年学习的材料。从风格上而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延安时期《中国青年》的传统，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它随着国家的建设和一项接一项的政治运动忠实地体现着时代的风格。在这18年中，《中国青年》为我们留下的一笔财富，是一大批具有时代典型的典型人物：抗美援朝中的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王崇伦、倪志福、郝建秀、张百发、李瑞环、王进喜、王林鹤、徐建春、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吕玉兰；青年英雄徐学惠、向秀丽；为人民服务的典型雷锋、以及解放军的杰出人物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英雄群体“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最为使《中国青年》骄傲的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是专为1963年3月《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以此为标志展开了一场学习雷锋的活动。这一期的《中国青年》各地加印了118万份，各地团委翻印了207万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一位炊事员因无法得到这一期《中国青年》，只得借来一本，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这本手抄的《中国青年》让编辑们大为感动，他们写信向这位青年要来了这本珍贵的手抄本，然后向他回赠了《中国青年》。周恩来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展览室中看到了这份手抄本，他十分感慨，当下对编辑部的领导说：“《中国青年》应该增加发行量，纸张不够，我可以帮助解决。”要知道，当时的最大困难还是纸张的短缺，《中国青年》因此出现了限量发行的情况，周恩来的这番话在当时对编辑部而言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共和

国总理亲自为一份刊物的发行操心，这绝对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

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这本机关刊题写了“中国青年”四个字，它似乎标志着这本刊物在当时无可比拟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是一个真正的阵地，许多高级领导人通过它发表着自己的指示、意见和表达某种态度，一些地方干部以能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为荣。《中国青年》的编辑可以轻易找到省委书记们约稿，记者们在各地的采访受到极大的尊重，甚至有过为了送一个记者从山西太谷到太原，以便赶上最后一班飞机向北京传送稿件，太谷火车站专门为这位记者开出一个火车头的奇事。《中国青年》毕竟是一份青年刊物，因此除了它时时不忘的教育青年这个任务之外，我们在它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当时可以说是有趣的内容，比如一个年轻姑娘因为穿了件花衣裳，下了几次馆子，便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有读者来信提出了质疑，编辑部明确回答：不对。《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愿你一天比一天更漂亮》这样的文章也出现在这本青年刊物上，让我们看到了那时这本刊物的一点轻松与活泼。但这样的表现只是偶尔的，政治的宣传才是它的主要任务，因此“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更多体现的是它的政治色彩，它的个性几乎淹没在其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青年》也随之再一次辞别了它的读者。这时的《中国青年》已经是一身火药气味，连它的老社长杨述也成为它批判的对象。8月16日，第16期《中国青年》出版，发表了《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伟大号召》和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消息，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及《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之后,这本《中国青年》就成了“文革”前的绝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也停刊了。这种命运没有人感到惊诧,因为那是一场噩梦,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是如此。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青年》,以其惊世骇俗的勇气和个性,成就了一番无与伦比的辉煌……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在农村干校“锻炼”了12年。

1978年,当这些编辑从农村回到北京的编辑部时,许多人已不再是青年。但是,经过12年的磨难,谁都有一种找回失去的岁月、重新做一番事业的愿望。

在沉寂了12年之后,《中国青年》以它的再一次复出唤起了人们对它的关注。这是它历史上的第四次复刊(如果1975年5月的试刊号也算做一次的话),但这次复刊绝不同于以往的三次,这一次犹如涅槃,脱胎换骨之后以它在创刊时曾表现过的惊世骇俗的勇气和个性,成就了它在中国期刊史上无与伦比的业绩。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刚一复刊便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作为机关刊,《中国青年》本该如它在“文革”之前那样,每期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完成宣传配合任务,但是在1978年,无论是社会发展形势还是编辑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上传下达式的宣传模式已无法再让人接受。

一方面,粉碎“四人帮”的兴奋过后,人们不得不继续深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打破思想的禁锢已成为人们渐渐明确的要求,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人们开始小心翼翼但极其热切地关注着一系列敏感的问题:怎样看待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门事件是不是革命行动?如何看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等人?怎样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何认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如同一个个巨大的挥之不去的问号,在“两个凡是”的重压下,人们疑虑重重。在思想的禁锢中生产力的解放根本无法实现,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成了一句空泛的政治口号。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在沉默中等待还是冲破禁区,已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另一方面,经过“文革”的磨难,重新回到新闻出版岗位的编辑记者们普遍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激情,这种激情在紧张而兴奋地筹备《中国青年》复刊工作的编辑记者们身上尤为强烈,一位编辑这样说:“经过十年动乱,我们这些从‘五七’干校回来不久的编辑记者都憋了一肚子话要说,都有站在新时期时代最前列的愿望,都矢志履行编辑记者的神圣职责。”当时社会上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使敏感的编辑记者们有一种置身历史转折点而发挥作用的激动。作为机关刊的《中国青年》从复刊伊始便充分展示着其创刊时期曾有过的勇气和个性。

1978年9月10日,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终于亮相,它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章痛斥了林彪、“四人帮”在我们国家搞了10年的现代迷信,与此文章

相配合，另一篇由著名理论工作者邢贲思写的《“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毫不留情地直指“两个凡是”的要穴，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无疑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但是，《中国青年》的战斗激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央主要领导人当时对天安门事件已有不改变结论的说法之时，《中国青年》冲破思想的障碍，顺应人民的呼声，在挑战“两个凡是”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在复刊的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是对思想禁区的一次毫不含糊的宣战，它几乎触到了“两个凡是”论固守的底线，因而这本《中国青年》一面世，就有了洛阳纸贵的场面，也以它后续的事件为机关刊的发展史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复刊的火爆为《中国青年》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之后，《中国青年》以其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表现，发起了名动一时的“潘晓讨论”，为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改革贡献了伦理价值的基础，同时也创造了发行400万份的奇迹，成就了期刊史上独有的一份辉煌。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随着青年思想观念更新周期的日益缩短，《中国青年》逐渐也出现了新的困惑。尽管《中国青年》也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但是只停留在如何引导青年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变化这一传统的宣传层面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分子。在这种忽视中，《中国青年》逐渐出现了新的危机，发行量的快速下跌使它在不知不觉中面对了生存的巨大压力，以致到了90年代中期，才有了它背水一战的悲

壮一页。

机关刊大胆闯市场，而今迈步从头越……

1995年，已经在北京西城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里“安居”了四年的《中国青年》终于不安起来。市场经济的残酷现实，最终让《中国青年》的优越感消失殆尽，长期四平八稳的养尊处优使它根本没有面对市场的敏感。看一看当时的《中国青年》，小16开64页的模样实在与一本大刊的身分不能相符。更为让《中国青年》难以接受的是，它的大刊身分已经不再为市场承认，只是存在于自己的记忆和不切实际的想象里。在长达70多年的日子里，尽管《中国青年》几生几死，但因为读者的离去而使它难以生存，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过去的所有辉煌都无法改变市场的拒绝，发行量是最好的评判标准。在这种尴尬的日子里，《中国青年》终于痛下改革的决心。那是一段有些兴奋也有些痛苦的日子，要放下过去的东西是困难的，因为有时你无法分清它是传统还是包袱。在一次全社的大会上，总编辑打开了一副条幅：“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由此可见《中国青年》改革的沉重和危急情势。整整一年，从刊物内容到编辑队伍都在酝酿改革。当1996年新的一期《中国青年》出版后，不少人大吃一惊，有人称它的这种改革是“惊险的一跳”。因为报刊市场的激烈竞争，当时不少报刊都在以缩减印张或降价来减少支出和维持市场份额，而《中国青年》却反其道而行，不仅由小16开本改